

明  
镜  
评  
论

# 故宫“瓷器门”后还虚掩多少暗角？

著名的墨菲定律告诉我们“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”,而且再微小的疏忽一旦结合在一起,就会酿成大错,引发最大的损失。

■王石川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就在故宫方面表示,已启动制订破损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的修复计划,并通过央视公布了破损哥窑瓷盘照片之后,网上对于这件受损的瓷器产生了质疑,特别是与故宫网站上那件公布的图片相比,两者完全不属于同一件瓷器。(8月2日《东方网》)

受损瓷盘照片涉嫌造假如获证实,就不是一般的自摆乌龙,而是愚弄公众的大欺天下。随着多方深入求证,人们还发现了不少细节。比如,肇事的研究人员被指“文保外行”,暴露出部分故宫人员缺少专业经验和技能,文保培训上存在漏洞。再比如,陷入一连串的诘问以来,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始终没有露面。

此外,媒体还披露,对故宫来说国宝被毁并不是先例。早在2008年,故宫收藏的惟一一件五代董源真迹《潇湘图卷》(一级

甲等文物)就曾在展出时被水滴淋湿受损。如出一辙的是,故宫没有及时将情况公之于众。

观复博物馆馆长、收藏专家马未都谈到宋瓷被毁时直言,最大的问题是责任心。对待文物没有责任心和警惕性,最容易出事故。故宫缺的正是责任心、敬畏心,缺的是举轻若重的慎重,缺的是如获至宝的专业,缺的是宝在人在的热爱。而一旦缺了这些,就必然存有暗角。

著名的墨菲定律告诉我们,“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”,而且再微小的疏忽一旦结合在一起,就会酿成大错,引发最大的损失。从故宫拙于善后、勤于遮蔽的姿态看,更显示今日的困局是一种必然。从多年来故宫成为舆论监督的盲区,一直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,就注定了它必然事故不断。

为此,笔者建议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,对故宫文物进行一次彻底而规范的盘查。同时,还应该下大力气整饬管理人员,管不好人,就管不好文物。



## “周游列国”的副市长都学到了啥

猜疑止于真相,信息公开才是破解围观的良方。而不断升温的舆论和民意,也映照出公众的真相饥渴和公正向往。

■羽人三

近日,四川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在接受采访时,自称“去过60多个国家”,引发网友围观。宜宾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,徐进说去了,那就是去了。不过,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已将“去过60多个国家”这句话删掉了。(8月2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徐副市长出国次数之多确实令人“惊叹”。不过,问题并不在于徐副市长去过多少国家,而在于他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去的。

如果徐副市长每次都是因公出国,那么随之而来的疑问是,在中纪委、监察部等三令五申严禁干部公款出国游,并做出明确的规定的当下,在“三公”消费早已被广大民众诟病和抵制的今天,徐副市长出国是否频繁了点?

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,徐副市长如此频繁地因公出国,又有何收获?如果仅仅因为“去过60多个国家,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性”,那学费未免太高了吧?更何况,这本身就是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。而作为政府领导,更应该弄明白的是如何

科学规划,少搞些政绩工程,否则出国60次倒不如去基层学习60天。

假如徐副市长60多次出国只是私人出旅,那无疑不啻于一份举报信。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,这笔巨额费用究竟从何而来?

猜疑止于真相,信息公开才是破解围观的良方。而不断升温的舆论和民意,也映照出公众的真相饥渴和公正向往。鉴于此,“去过60多个国家”应有下文分解。但愿当事官员能秉着负责的态度尽快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,并主动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。

## “最牛违法建筑”损了谁

没有后续的责任追究,违法者就不会有太大损失,而渎职的权力反而因此大犬“创收”,受到损失的只有公共利益及法治精神。

■盛翔

一个被浙江省、金华市均列为重点项目的建设工程,成为当地最大的违法建筑——不仅改变建筑使用功能,建筑面积更超出审批近4万平方米。一旦违建成功,开发商将获利8亿多元。当地市民称之为“最牛违法建筑”,因为它距市政府大楼只有100多米,可在一年半的建设期间,虽多次遭到举报,却无人制止。直到近日金华市城管局才作出“没收违法建筑面积39918.45平方米并处罚款”的行政处罚决定。该局称,这是目前对违法建筑最严厉的处罚。(8月1日新华社)

所谓“最牛违法建筑”,人们惊呼的是其违法规模之大、距离市政府之近以及省级重点项目的特殊身份。然而,真正“牛”的不是违法建筑,而是失职渎职的权力。政府部门为何放任眼皮底下的违法建筑不管,才是真正需要追问的。

对违法建筑先是不闻不问,最后一下子没收,政府部门的失职却带来了数亿元的国有资产“收益”,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,究竟怎样从中“没收”近4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,本身就是一件模棱两可的事情。处罚看似很严厉,其实很可能只是一时应付舆论之举。在建设期间不作为,建成符合法规“不能拆除”的情形后才予以“没

收”,也许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曲线操作。

退一步说,就算这是最严厉的处罚,那么就在市政府门前的违法建筑,为何如此长时间都得不到处理,非要等到建成之后才来没收呢?这究竟算是先养鱼后得利的“养鱼执法”,还是权力参与违法建筑的巨额分赃?倘若违法必究不是目的,参与分赃才是目的,这样的执法还有何正义可言?

无论是哪一种情况,如果没有后续的责任追究,违法者就不会有太大损失,而渎职的权力反而因此大大“创收”,受到损失的只有公共利益及法治精神。

## 治堵 放过”公车是权力太“硬”

要想对公车乱象予以釜底抽薪,就必须直面主要矛盾。否则,既消耗了公众的热情,也消耗了公权的信誉。

■禾刀

历经近8个月的反复修改,广州治堵方案出台。此次公布的方案与征求意见稿相比,大众关注的“限制私家车上牌”、“征收拥堵费”、“单双号限行”等措施并未出现。同时,“2015年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”措施也被删除。(8月2日《南方日报》)

如私家车主所愿,治堵方案最终放弃了对私家车严加限制的初衷。也如公家车主所愿,该方案拿掉了对公车的限制性举措。治堵方案最终回归中庸,看似“公私”兼顾,两边讨好,但道路空间并不会凭空增长,堵车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。更重要的是,原本被公众认为可以限制公车过度增长的新政,在完成舆论面前的惊艳亮相后,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利益的权衡。

治理公车,众望所归,却又越治越乱。有的地方设置偷拍部门,有的张贴公车标识,有的更改公车车牌让其“现形”……办法不尽相同,结果却无一例外:只要监管一松,效果立马一场空。极具讽刺意义的是,当济南那位“专拍公车哥”横空出世,每天悠闲地拍着大量疑似公车私用现象之时,监管部门却一如既往地扮演着标准的“看客”。

公车消费大抵有两大特点:一是占有公家的利,所以公车私用极其频繁;二是依附权力,被一些人视为个人权力地位的象征。如今,问题清楚地摆在面前,要想对公车乱象予以釜底抽薪,就必须直面主要矛盾。如果一再迁回于公车改革核心问题的外围,靠旁敲侧击的改革零敲牛皮糖,既消耗了公众的热情,也消耗了公权的信誉。